

沙发里的人生

文 / 阿光

居家的日子，跟沙发相处的时间突然多了起来。

最近在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小说《猫眼》。写这本书时阿特伍德49岁了，但她用十分清晰的笔触再现了童年生活的各种细节。她提到好朋友的母亲史密斯太太，这位太太身体不好，每天下午都要休息一会儿，但她不在卧室休息，而是躺在客厅里的切斯特菲尔德沙发上，盖着一条阿富汗编织毛毯，头靠着沙发扶手，脖子下面垫着一个枕头。“她总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就像摆在博物馆里的东西”，这让小说中的“我”又厌恶又害怕，很想知道史密斯太太那时在想什么。后来“我”成了一位画家，以这个场景为蓝本创作了一幅画，画中的史密斯太太已经头发斑白，全身只围着一条印花围裙，歪歪斜斜地躺在栗色天鹅绒沙发上，“正准备起身前往天堂。”

在沙发的历史上，切斯特菲尔德沙发是一个恒久流传的经典，它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，最大的特点是扶手和靠背一样高，并且有经典的绗缝拉扣设

计和流畅的洛可可风格的曲线。可以想象一下18世纪的贵族们坐在上面的样子：因为靠背没那么高，所以衣服不会因为和沙发大面积接触而产生皱褶，而且人没有那么多遮挡，所以显得亲切而开放。这种沙发一直到史密斯太太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都还非常流行，在加拿大，甚至一度成为沙发的代名词。因为对面料的要求比较高，切斯特菲尔德沙发往往造价昂贵，一直是富裕阶层的象征。



可能是这种富裕的形象给“我”带来了刺痛，可能是史密斯太太曾对“我”有过不公正的评价，所以这个画面一直留在主人公的潜意识中。后来她画了许多跟沙发有关的作品。“这些东西都充满了焦虑，但那不是我本人的焦虑，焦虑是这些事物自带的。”一个饱受肉体折磨的女人，躺在一个象征着舒适生活的沙发上，这到底暗示了什么呢？

不如想想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沙发吧。

这几年我去朋友家，发现很多人的客厅里已经没有电视机了，曾经它是客厅生活的中心，所有家具的摆放都要顺应电视机的位置，沙发自然也是为看电视服务的。但现在，电视机慢慢消失，沙发却一直保留下来，而且获得了更大的摆放自由：它不必靠墙，不必组成成套，也不必非得搭配茶几。而且，随着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，很多人的客厅已经失去了待客的功能，沙发的作用，也变得暧昧不清了。

其实，这才是沙发最吸引人的地



方。它安抚焦虑，又像阿特伍德说的那样，自带一种焦虑。即使不再承担展示功能，不再牵系身份和财富，沙发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是一种复杂的存在。

想象一张长沙发，可坐可卧，但坐不同于椅子上的正襟危坐，卧也不同于床上的安然高卧，而是带着很多临时的、不正式的气息。躺在沙发上睡觉代表你只想小憩一下，坐在沙发上看书代表你看的多半是闲书。沙发离地面比较近，这带来几分“堕落”的感觉，但人又随时可以翻身起来，去从事更加严肃的活动。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：无论躺在沙发上，还是坐在沙发上，你都无需跟人面对面，这代表了一种独处，是无需掩饰的、公之于众的独处，又是随时可能被打破的、摇摇欲坠的独处。

史密斯太太可能就是想要这种独处，所以她逃离了卧室，那里有她丈夫若隐若现的存在。她在休息，但又并没有从日常劳作中退场，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能听到厨房的动静和孩子们的跑动，她依然占据着日常生活的中心。所以主人公在描画史密斯太太的时候，替

她剥去了很多伪装，但独独为她保留了围裙，那是她摆脱不掉的责任。从书里我们还知道：史密斯太太出生在一个小地方，经历了战争，漂流了很久才在大城市温哥华定居下来，拥有了一份相对舒适的生活，尽管身体坏了，但她仍旧可以每天躺在沙发上，沙发温柔的曲线承托着她的身体，这的确是她最接近天堂的时刻。

相比之下，男人躺在沙发上，就更带着一种纯粹的撤退和休战意味。契诃夫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就经常躺在沙发上，并且不断调整角度寻找最舒服的姿

势。他经常提到一种土耳其沙发，具体样式已不可考，我们只知道那种沙发很矮，大概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流行过，因为托尔斯泰和后来的纳博科夫也曾提到过这种沙发。在契诃夫那里，躺在沙发上的男人总是耽于幻想，对生活不满但缺乏行动力，也没有足够的勇气，在《小公务员之死》中，那个饱受内心折磨的男人甚至就死在了沙发上。但契诃夫是温柔的，那是一种沙发式的温柔，他了解人脆弱的一面，并给予充分的包容。他的人物就算躺在沙发上无法动弹的时候，仍然在仰望着星空。■